

## 邓小平八次会见“世界船王”

包玉刚是镇海(今浙江宁波市镇海区)庄市钟包村人,1948年底迁居香港。20世纪50年代,包玉刚白手起家,投身航运业,凭借卓越的商业眼光和经营能力,缔造了庞大的航运帝国。至1981年,他拥有船只210艘,总吨位2100万吨,稳坐世界七大船王第一把交椅。早在1981年上半年,当外界对中国仍充满偏见和猜疑时,包玉刚就急切地再次提出要拜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让他欣喜的是,不久之后,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早在1978年秋,他就曾试探性地给国内有关部门发来信函,言辞恳切地要求回大陆探亲。此事惊动了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他立即授意国务院主持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回函: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国。带着这份电报,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踏上了北上的航班。在京期间,尽管因故未能与敬仰已久的邓小平会面,但敏感的包玉刚还是发现了北京激动人心的变化,中国正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1979年,包玉刚通过其表兄、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卢绪章(1911—1995),表示将以其父亲包兆龙名义向内地捐赠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的旅游饭店——兆龙饭店,另外1000万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但这件事当时却难住了卢绪章,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一切外援。为此卢绪章起草了一份报告,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的答复相当干脆: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包玉刚父子一行。邓小平热情地握着包玉刚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尽管是初次见面,但共同关心的话题,使务实的政治家与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从1981年至1984年短短四年间,邓小平就八次会见包玉刚,每次见面他们都共商国是,共叙友情,纵论天下事。慕安

## 遵义会议前后的毛泽东

1月15日,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大会在贵州遵义举行。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被誉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 会前酝酿:担架上的谋略

1934年10月,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然而,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导致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严重的挫折和险境使许多干部产生质疑与不满。

这时,不仅仅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意识到形势的危急,还有一些曾经在党内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同志如张闻天、王稼祥也逐渐意识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机缘巧合,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被飞机炸伤,长征开始时伤口尚未痊愈,只得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进。而长征前毛泽东正在养病,长征时也乘担架同行。两人在休息和宿营时经常一起交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都认为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才能挽救时局。

但毛泽东担心:“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提议:“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毛泽东十分赞成,并要王稼祥多找几位同志商量。随后,王稼祥找到张闻天,张闻天早就在考虑、反思这个问题,于是三人很快达成一致。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周恩来还进一步提议,将会议扩大到兵团指挥员,让更多具有丰富指挥和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参会,以确保会议能够依据多数同志意见作出正确决议。因为如果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博古(秦邦宪)、李德(华夫)、张闻天、周恩来四人参加,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难以获得圆满的结果。于是,毛泽东、王稼祥等又去找几位军队负责同志谈心。这时,担架再次提供了平台,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渡湘江之后脚化脓,也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便找机会把看法和他谈了,得到了他的支持和赞同。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

毛泽东也积极活动,被李德批评“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事实永远都最有说服力。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走来一路争论。慢慢的,许多中央的同志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

召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 会场争锋:历史的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由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当时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的地址设在红军总部驻地——原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人。包括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中央秘书长1人: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7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此外,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这20人中,李卓然只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彭德怀则因战事离席赶回了前线。

当时并没有名单座次,主持人博古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其他人随意就座。博古首先做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的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客观因素,而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随即,张闻天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好的意见,做了一个“反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

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他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刚讲完,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还率先明确地提出应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也再次发言表态,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发了言,林彪没有明确表态。到会的人中,只有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由于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毛泽东,对会议的进程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

会议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指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历史,就在这缓缓转向。

### 会后余波:传达与交权

遵义会议结束后并未马上进行传达。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获通过。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及基层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和精神。未能参加遵义会议的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则由中共中央2月28日发电报进行传达。在传达时,规定传达到支部时,点李德的名,在团以上干部传达时,再点博古的名。

决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拥护。这个决议现在看来,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指出政治路线的错误。但在长征中,“军队打了败仗一切都垮,打了胜仗一切都可

以解决”,军事路线最紧迫,也最容易赢得共鸣。在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

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使他有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和影响力。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还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打鼓新场风波即为一个重要关节点。

3月10日,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急电建议中央攻打打鼓新场的黔军。朱德认为可以打,因为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攻占此战略要地,对红军西进极为有利。但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兵力众多,一旦进攻,面临的敌军将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两人意见出现分歧,于是由张闻天主持在鸭溪苟坝召开了军委会议。到会的20多人均赞成打,毛泽东再三反对,并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为要挟,却未能劝服大家。周恩来回忆说:“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最终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后来的军事情报也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

因为打鼓新场的争论,毛泽东意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那么多人指挥作战,还是要成立一个几人小组专门指挥作战。于是组成了新的三人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确立起来。刘慧娟